

Riding the River Home: A Complete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Fan Chengda's (1126–1193) Diary of a Boat Trip to Wu (Wuchuan Lu). By James M. Harget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i + 302. \$55.00.

提到范成大(1126–1193)，大家最熟悉的恐怕是他所贏得的田園詩人的美名。范的〈四時田園雜興〉組詩描述他晚年在家鄉平江府(今江蘇蘇州)石湖山莊的生活，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了重要的位置。他本人更以石湖居士自稱，並將其文集命名為《范石湖集》。其實，范成大一生的成就遠不止他的文學造詣。他還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曾位居參知政事(副宰相)，並長期任職地方，足跡遍佈長江流域及南方其他地區。單是從1170到1177年的八年間，范成大就三次長途跋涉。他先是於1170年作為朝廷使臣從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使金，北抵中都(今北京)。第二年又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今廣西桂林)。1172年冬，范成大從家鄉蘇州出發，明年春抵達桂林。1174年冬他又被改派四川制置使。在成都任職大約兩年後，范成大於1177年夏離蜀，於深秋返回闊別五年的故里。

范成大的這三次遠任無疑使他位列中國古代大旅行家之列。他在旅行途中不僅創作了數以百計的詩詞，還留給後人三部長篇遊記：《攬轡錄》、《驂鸞錄》和《吳船錄》。范成大的這些著作，與他的好友陸游(1125–1210)的《入蜀記》一樣，成為中國遊記文學創作發展的里程碑。《入蜀記》早於1981年由張春樹和Joan Smythe翻譯成英文。¹《攬轡錄》和《驂鸞錄》也已由何瞻(James M. Hargett)翻譯，於1989年出版。²現在《吳船錄》英文譯本問世，這不僅有助於進一步加深外國學者、學生和一般讀者對范成大精神文化世界的了解，連世界各國從事中國遊記文學、文化地理、宋代文化社會史和地方史研究的同行，都會受益於何瞻多年深入扎實的研究成果。

《吳船錄》全文16,700字，是范成大三篇遊記中最長的一篇，記載作者1177年從成都經岷江泛長江東歸故鄉蘇州的經歷。范成大於五月二十九日(西曆6月27日)出發，十月三日(西曆10月26日)抵達目的地。全部行程約5,000里，歷時122天。《吳船錄》包括日志110條，除記載大量有關長江流域名勝古蹟、宗教信仰儀式和日常生活的材料外，還保存了一些其他古籍不曾涉及的資料，特別是僧人繼業北宋初年去印度的行程和經歷(頁70–73)及作者親眼目覩畫家孫太古作品的情況(頁43)。

何瞻的譯著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的重點是《吳船錄》的結構、內容、版本和范成大的行程。該部份的第一節對范成大的經歷、宦海生涯和文學創作進行了簡單

¹ Chun-shu Chang and Joan Smythe, *South Chin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 Translation of Lu Yu's Travel Diaries, July 3–December 6, 117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² James M. Hargett,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 (Stuttgart, Germany: 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9).

介紹。這一節篇幅簡短是因為何瞻在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已對范成大的生平事蹟、文學作品，特別是遊記在唐宋的發展及范成大的貢獻，進行了深入詳細的探討。遊記這種文學形式雖然肇始於唐，但是直到宋代才趨於成熟。何瞻把宋代遊記分為三大類：一日或多日遊散記 (Daytrip Essays)、出使記實 (Embassy Accounts) 和江河遊記 (River Diaries)。³ 在一日或多日遊散記方面，何瞻認為貢獻最大的宋代文人當推王安石和蘇軾。范成大的《攬轡錄》是典型的出使遊記，陸游的《入蜀記》和范成大的《驂鸞錄》及《吳船錄》則是江河遊記的代表作。陸游和范成大同於十二世紀七十年代進出四川，《入蜀記》(1170) 和《吳船錄》因此在內容上有很多重疊之處，本章的第三節即對這兩部遊記作了一些簡單比較；而書中所附范成大在岷江和長江的旅行圖及逐日行程表 (頁 19–26) 亦可與張春樹譯著中陸游的長江旅行圖及行程表 (頁 30–37) 對比使用。這樣不僅可以看出水流、風速和氣候對順江而下和逆流而上的旅行者行程的影響，而且可以更完整地理解長江沿岸人文及自然風光的分佈情況。

何瞻稱《吳船錄》是范成大對他一路見聞的全景和近距離觀察的「反應」，因此具有強烈的「印象主義」特徵。同時，由於范成大作為旅行者一直處於動的狀態，他筆下的景物也是動態的 (頁 10)。這並不是說《吳船錄》通篇都著眼於景物描述。范成大並不滿足於停留在描述所見所聞上，相反，他毫不掩飾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和他的個人好惡。例如，在都江堰，當范成大聽說當地每年有五萬隻羊用於祭祀，羊因此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時，氣憤地寫道：「甚矣其殺也。余作詩刻石以諷，冀神聽萬一感動云。」⁴ 但何瞻強調，與范成大在旅途中的詩作相比，《吳船錄》偏重記敘旅行經歷。可以說，范成大更傾向通過詩歌來抒發他在旅行中的思想感情。

本書的第二部份包括《吳船錄》全文譯文和大量注釋。翻譯像《吳船錄》這樣的作品，對譯者文字工夫和文史方面造詣的要求不言而喻。總體上說，何瞻的翻譯尊重原文和原作者的風格，且有很強的可讀性。茲舉一例說明：在離開成都的第十九天 (丙戌，西曆 7 月 15 日)，范成大寫道：「下山，入小巷，至廣福院。中有水洞，靜聽洞中，時有金玉聲，琅然清越，不知水滴何許作此聲也。舊名東丁水，寺亦因名東丁院，山谷更名方響洞，題詩云：『古人名此東丁水，自古丁東直到今。我為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翻譯這段文字，不僅要傳達流水的金玉之聲，還要尊重黃庭堅 (1045–1105) 詩作的風格。譯文如下：

I descended the mountain, entered a small lane, and reached the Extensive Prosperity Cloister. Inside it there is a watery grotto. In the silence of the grotto from time to time I heard the clanking sound of metal and jade. It was a tinkling-

³ Ibid., pp. 45–61.

⁴ 范成大：《范成大筆記六種·吳船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189。

like sound, clear and loud. I do not know how dripping water can make such a sound. The former name of this grotto was Clink-Clank Waters. Because of this the cloister was called Clink-Clank Cloister. Shangu changed its name to Rectangular Chimes Grotto. He wrote a poem that goes: “Men of ancient times called it the Clink-Clank Waters; It has clanked and clinked from ancient times until today. Now I’ve changed the name to Rectangular Chimes Grotto; It is essential to know that the scene here is clear and melodious.” (pp. 57–58)

何瞻的譯文準確生動，突出了黃庭堅和范成大反覆運用「東」、「丁」二字來強調水聲之清的做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何瞻還把數以百計的自然人文景觀的名字逐字翻譯成了英文。除了上面提到的廣福院、廣丁院和方響洞，類似的例子有浮雲亭 (Floating Clouds Pavilion, p. 42)、獠澤 (Aboriginal Marsh, p. 46)、章華臺 (Manifest Splendor Terrace, p. 145)、賞心亭 (Pleasing-the-Heart Pavilion, p. 159) 等，這樣無疑有助於《吳船錄》的英文讀者更深入地了解宋代文化及文人生活。

《吳船錄》通篇最難翻譯的部份可能是范成大對其峨眉之行的記載，這一部份佔全部遊記五分之一的篇幅。范成大不僅詳細記載了峨眉山之秀、之險和他個人的登山經歷，而且強調峨眉山在中國道教和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何瞻對范成大關於峨眉山佛教寺院的歷史、宋中央政府對峨眉山的政策，以及他本人目睹佛光的記載的翻譯都非常準確，並且提供了 169 條翔實的注釋。何瞻認為，范成大關於佛光的記載是全書最為精彩的段落之一：

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峰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

In the very center of the globe was a hollow of concentrated brightness. Each of us onlookers saw our forms in the hollow and bright spot, without the slightest detail hidden, just as if we were looking in a mirror. If you raise a hand or move a foot, the reflection does likewise. And yet you will not see the reflection of the person standing right next to you. The monk said: “This is the Body-absorbing Light.” When the light disappeared, winds arose from the mountains in front and the clouds scurried about. In the wind and clouds there again appeared a huge, globular form of light. It spanned across several mountains, exhausting every possible color and blending them into a beautiful array. The plants and trees on the peaks and ridges were so fresh and alluring, so gorgeous and striking, that you could not look at them directly. When the clouds and fogs have scattered and only this light remains shining, people call it a “Clear-Sky Manifestation.” (pp. 66–67)

與他的高質量譯文同樣引人注目的是何瞻為譯文所作的大量注釋。與《攬轡錄》和《騷鸞錄》一樣，《吳船錄》注釋的篇幅遠遠超過譯文的篇幅。何瞻為 16,000 餘字的正文共提供注釋 717 條。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個：第一，范成大是知名學者和詩人，他在遊記中大量引用了各種典故及前人的文學作品，譯者需要加以考證說明。例如，何瞻指出，《吳船錄》中引用的一首黃庭堅的詩，現存的黃庭堅文集並未收入，但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卻有記載（頁 57-58, 104）；第二，范成大旅行所經的長江流域，集中了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其歷史淵源需要譯者補充解釋，其中包括對峨眉山、三峽、廬山著名風景的詳細介紹；第三，范成大在旅途中不僅遊山玩水，而且接觸了許多文人和地方官，在這方面也需譯者提供傳記資料。基於以上原因，何瞻在翻譯《吳船錄》的過程中，參考了大量通志、地方史和文集。

何瞻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從本書長達八十頁的索引中也可見一斑。筆者從原文中特意找出的多個不常見的人名、地名（黃牛廟、看月榭、巨觚、曹訓、范長生等），都無一例外地列在索引中。值得一提的是，何瞻在 *On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中把石湖翻譯成 Boulder Lake。在本書中，石湖成了 Rocky Lake。

張聰

美國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歷史系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Platt.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78. \$49.95/£32.95.

讀完這本書，不禁感到驚異，因為這位作者，美國麻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波拉特（Stephen R. Platt），想要把湖南寫成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從書名看，作者標出湖南省的愛國者，以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好像是將湖南作為地方史來研究，其實不然。地方史研究雖重地方色彩，畢竟是一國之地方，然而此書作者斷言，「湖南不是中國的縮影，就像中國不是亞洲的縮影一樣」（頁 4）；認為湖南人的忠誠不出湖南，也就是湖南第一，即使會考慮到中國，最多是第二位而已。作者更清楚地說，他不是要以湖南來增飾中國，而是要以湖南來「質疑」（question）中國，提出「對中國前途的另類看法」（visions of another Chinese future, 頁 5），不言而喻，那是一個分裂中國的未來。於是，他提出所謂「湖南民族主義」（Hunanese Nationalism），也就自認為理所當然了。這種論調在晚近西方世界也許並不覺得陌生，因為自蘇聯解體以後，總覺得威脅來自過於龐大的中國，且不論政治上的大量「中國威脅論」，即使在學界也時常